



# 考古学与民族学、民俗学的互渗

## ——以长江三峡地区文化遗产为例

◆ 赵冬菊 (湖北省宜昌市博物馆)

考古学与民族学、民俗学有着密切的关系。为此,笔者欲结合长江三峡地区文化遗产之特征,以及工作中的一些体验,就考古学与民族学、民俗学的关系谈些不成熟的看法。

### 一、三峡考古揭示的民族、民俗文化事象

据《长江三峡工程淹没及迁建区文物古迹保护规划报告》显示:三峡地区需保护的文物和文物点多达1282处,其中地下文物829处,地面文物453处<sup>①</sup>。可见三峡文化遗存、遗物之多和三峡历史与文化的悠远与博大。始于上个世纪初期的三峡考古,对揭开三峡地区的古代历史和文化奥秘掀开了新的一页,获得了一系列的考古成果,特别是获得了不少与巴、楚等民族、民俗文化有关的考古成果。

从现有的考古情况来看,考古工作者先后在三峡地区的宜昌、夷陵、宜都、兴山、秭归、巴东、建始、万洲、涪陵、忠县、巫山、云阳,及相邻地区的湖南石门、桑植、澧县、泸溪、麻阳、龙山、辰溪、岳阳等地,均发现了大量的古文化遗存。

在上述三峡考古中,发现有内涵丰富和能揭示多种民族、民俗文化现象的资料。比如,通过对“长阳人”和夷陵区晓峰悬棺的发现和对其“DNA”的分析研究,找到了它们与古代巴人的亲缘关系,证明了湖北长阳县就是巴人故里所在,今天的土家族人就是古代巴人的后裔<sup>②</sup>。在新石器时代的考古发现中,与巴民族或巴文化有关的文化遗存在三峡地区屡见不鲜<sup>③</sup>。进入夏商以后,三峡地区的巴文化遗存遗物更是十分丰富。仅在渝东鄂西就发现数十处之多<sup>④</sup>。在一些墓葬中,也发现了不少巴文化的遗存、遗物,仅以巴式青铜器为代表的随葬品就出土了不少<sup>⑤</sup>。在三峡的考古文化中,还发现了不少楚文化的遗存遗物,如,中堡岛遗址、秭归茅坪下屋子遗址、柳林溪遗址和龚

家大沟遗址等即是。在这些遗址出土的遗物从形态特征来看,应属战国楚文化范畴<sup>⑥</sup>。据调查和研究:“在秭归县境内的西陵峡两岸,上迄牛口,下至宜昌南津关,发现了许多春秋以后的楚文化遗存”<sup>⑦</sup>。这都说明三峡地区不仅有巴人的众多遗存、遗物,楚人也在这里留下了丰富的文化遗存。

另外,在三峡考古中还发现有反映巴、楚、越等民族文化关系的遗存遗物。秭归水田坝东周楚墓中出土有巴式单虎钮鐙于。秭归庙坪的一座春秋墓,墓制从楚俗,所出陶罐为楚式,而同出的铜剑、铜矛、铜镞则是巴式<sup>⑧</sup>。巴东西瀼口战国墓中,M1随葬的鼎、敦、壶等陶器组合是楚族的礼器组合,为典型的楚文化墓葬。M8则出土了2件柳叶形剑和1件楚地罕见的鸟嘴状戈。在巴东官渡口等地的战国墓葬中,也发现有巴式柳叶形剑、钺与楚文化的鼎、敦、壶同出的现象<sup>⑨</sup>。枝江肖家山墓群(战国、秦代、西汉)出土有鼎、敦、壶为基本组合的楚式仿铜礼器,个别墓出土有越式器,其西汉前期15座墓中有个别秦墓。天门堡的两座战国中期墓,所出陶器鼎、敦、壶等和所出铜器剑、勺、刻刀等为楚式,所出扁圆形甬钟、六棱形实柄钲、柳叶形剑和虎钮鐙于属巴式,一件甬钟的甬头端为虎头形,一件钲的衡部有四个变形虎纹<sup>⑩</sup>。襄樊山湾一楚墓中,出土过一件柳叶形巴式短剑<sup>⑪</sup>。1980年在秭归香溪出土的一件“越王州勾”剑,更反映出多个民族和多种文化的交融,“是研究楚、越、巴等关系的一件不可多得的文物珍品……”<sup>⑫</sup>

在三峡的考古发现中,也有反映秦、汉文化的遗存、遗物。如,荆门一楚墓中所出带铭文的“大武铜戚”,“戚”的形状如巴戈<sup>⑬</sup>。“大武”是乐舞的名称,为周武王灭商后而作,属中原文化,后传到了楚国,说明三种文化在这里有了交流。20世纪70年代,考古

工作者在宜昌的前坪、葛洲坝所发掘的43座战国至两汉墓葬中,有6座战国墓为秦墓,但出土的器物却多为楚文化性质。而23号墓所出的柳叶形铜矛,矛身为“巴式剑”式,上有“手心纹”,为典型的巴文化遗物。发掘的30座西汉墓中,多为楚裔汉人墓,但也杂有巴裔汉人或汉初巴人墓<sup>⑭</sup>……

从三峡考古所揭示的这些多个民族和多种民族民俗文化,具有特殊的意义。因为它不但反映着三峡地区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多民族交错杂处的地带,而且对我们研究这些民族的源流、关系,以及复原这些民族当时的社会状况等,都提供了难得的实物资料,使得考古学和民族学在这里相互渗透、相互补充,共同完成着复原当时社会经济、文化等原生态状况的任务。

民族学是研究包括民族的来源、发展过程、地理分布、民族接触、文化交流、生产生活方式等民族特点和发展规律等在内的人类、民族及其文化的社会科学,涵盖着以民族为研究对象及其规律的多个学科,如,文化人类学、民族史、民族理论、民族经济、民族艺术等。而上述三峡地区的考古发现及其所揭示的民族现象正是民族学,特别是民族史所需要的。我们通过三峡地下考古成果便能有效地补充文献对三峡民族文化历史记录中的不足,如,巴人的起源在哪里、祖先是谁,源流怎样,这些问题,都因巴人曾是一个有语言而无文字的民族而使得其在古代文献中甚少记载,因此,也给包括巴文化的起源等在内的诸多问题的研究带来了不少困惑,使得学界对这些问题在相当长的时间内都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而“长阳人”化石和晓峰悬棺的发现,及其我们的研究,特别是通过“DNA”提取古人遗骨基因和现代人血样基因的对比研究,寻找到了与古人关联的后裔群体<sup>⑮</sup>,证明“长阳人”和晓峰悬棺的主人与巴人有着亲缘关系,这对研究巴人的起源无疑提供了重要的佐证。还有出自于三峡新石器时代的各种文化,包括石器、陶器,特别是陶器的烧制技术、造型、纹饰等等,则既反映着三峡先民的经济状况和艺术涵养,包涵着他们的经济能力和审美情趣,为我们研究三峡民族经济和民族艺术提供了难得的素材。

另外,在大量的文化遗存中,所出土的动物骨骼化石或动植物化石标本,以及各种生产工具和生活用具,也都反映出三峡古代先民或民族的经济和生活状况。如,我们在三峡的巴文化遗存中发现的大量动物骨骼化石或动植物化石标本,以及在葛洲坝发现的一棵6000年前的古树——属于热带和亚热带

的重阳木(又名秋风)<sup>⑯</sup>,就充分反映出巴人曾经所拥有的良好生态环境及其民族经济状况。所以,考古学又反映出了很多民族学要研究的内容。这是考古学对民族学作出的重要贡献。因为田野考古的现实材料,如文化区、文化层和文化特征等,层次分明,说服力强。考古工作者不仅可以靠地层分析、了解某个文化层的相对年代,而且可以用新的科学技术方法,如,碳14测定,测定出这个文化层的遗存物的绝对年代。根据这些材料,考古工作者对历史进行分期……这些对研究各民族历史发展过程及其规律非常有用。而民族学的调查是调查具体民族的现状,就这个具体民族的历史发展过程来讲,仅是它的一个横截面,而对这个民族历史发展过程的纵截面及其规律,是不能亲眼看到的。要了解这些,除了应用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发展理论和民族学资料的比较研究外,最宝贵的是考古学资料所复原出的民族社会经济文化状况和民俗事项。

不仅如此,考古学的技术学,对民族技术学也很有帮助。因为考古学很重视生产技术的研究,如对发掘出来的生产工具和使用武器,究竟是怎样生产和制造出来的,这就涉及到生产力的问题。生产力又决定着生产关系。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统一就是生产方式。一定的生产方式代表着一定的社会经济形态。因此,生产技术对社会经济形态有很大影响。所以,考古工作者对生产技术的研究成果,对民族学研究某种社会经济形态非常有用。而民族学资料对考古工作者了解这些生产工具和实用武器等的使用方法,也很有价值<sup>⑰</sup>。

在三峡的考古活动中,我们还可以发现当时居民的生产、生活习俗——生产工具主要是石器,生活用具主要是陶器,以捕鱼、打猎、种植水稻为主要物质生活来源,主要食物是野生动物和鱼类,渔业在其经济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因此,逐水而居也就成为其居住的重要特点。亦因此,在三峡所发现和发掘的遗址中,其遗存位置因此多在水边或水边台地上,反映了古代巴、楚民族临水而居的居住特点和建筑方式。为使建筑物防潮,他们又采用特殊的建筑形式——吊脚楼(或称干栏式建筑)。在宜昌中堡岛,考古工作者在“发现沟漕的同时,还清理出长方形或方形的吊脚楼式居住遗迹”<sup>⑱</sup>。在秭归渡口遗址的商文化遗存中也发现有“干栏式建筑”遗迹。在宜都红花套遗址出土有炭化的稻壳、稻梗等,并出土有竹片,说明当时这里的农业已有了相当的发展,且有以竹拌草泥筑房的习俗。在前述的考古发现中,有不少与

“虎”有关的器物,如,虎钮𦣻于、虎头饰铜剑等,又反映出巴人的“虎”图腾信仰,是巴人信仰民俗的反映。另从发现和发掘的墓葬来看,无论是墓地的选择,方位的确定,还是随葬品的多寡等,都反映出三峡古代居民的葬制葬俗。如,秭归卜庄河古墓群中,有不少砖室、石室墓的葬具,并有人骨被焚烧和一墓多骨的葬制葬俗现象。在墓向上,其M2、M3西汉墓为东西向<sup>⑧</sup>,而宜昌前坪西汉墓则多为南北向<sup>⑨</sup>。前不久,宜昌市博物馆的考古工作者在兴山县邓家坝古墓群(汉代)发掘的一座砖室墓里,仅以墓砖的纹饰而论,就有回形纹、菱形纹、方格纹。这些纹饰既是汉代人对人死如生、死后也应有一个好居处的观念,而将其墓室进行美化装饰的产物,也是其习俗信仰和审美情趣的反映。所以,不同的墓葬表现出了不同的习俗特点,

考古发现的上述习俗特点,与民俗学要研究的民俗事项,包括生产生活民俗、经济民俗、信仰民俗等等在这里也得到了补充和印证。如,前述兴山县邓家坝古墓群中一座砖室墓的几种纹饰不但流行于汉代,而且在三峡地区的现有民俗文化,特别是织品、绣品中,也仍然保留和应用着。可见考古与民俗的不可分离。

## 二、三峡地区民族民俗文物研究与考古研究的交汇和互渗

三峡地区不但在古代有三苗、群蛮、百濮、𡵚、襄、彭、巴、蜀、楚、越、秦等多个民族在这里繁衍生息,而且在当今也有多个民族在这里生活。据宜昌市民族宗教局的统计资料显示,仅现在的宜昌地区就有汉、土家、苗、回、侗、畲、壮、蒙古、白等44个民族和40多万人口在这里生活。这些民族存留下来的民族民俗文化十分丰富<sup>⑩</sup>,并极具地方特点。

秦汉以后,巴被秦所灭,但巴人后裔土家族却依然保存了该民族自身的民族民俗文化精华,并留下了十分丰富的民族民俗文物,比如,生产中的各种工具和生活中的各种用具(如服饰、家具、石碾、石磨、石碓、烟斗等);建筑方面的吊脚楼及古建筑中的宗教寺庙及其庙内的各种物件;音乐舞蹈方面的咚咚喹、巴渝舞、芽谷斯舞、摆手舞及其摆手堂和乐器唢呐等;民歌方面的利川民歌《龙船调》和流行在三峡地区的川江号子、薅草锣鼓歌等;工艺方面的挑花、刺绣、织锦、竹编、根雕等手工艺品(其中,绣花鞋、帽、壁挂、背带、抱裙、头巾、枕套、鞋子等较多),尤其是其代表作西南卡普久负盛名,享誉国内外;民间艺术方面的字画、剪纸、傩面具;喜庆日子的喝咂酒习

俗,及其活动过程中所用的竹管、酒罐;民间节日、礼仪等活动及活动过程中的一些用品,以及丧葬、祭祀等活动中的不少服饰、法器……都数不胜数,都是重要的民族民俗文物。

巴人及其后裔土家族的民族民俗文物如此丰富,其他民族留下来的民族民俗文物亦为数不少……

我们知道,民族民俗文物是研究民族民俗文化的重要实物载体,也是民族学和民俗学研究的重要对象,它既涵盖着古代民族的诸多信息,也包括有近现代甚至当代的民族民俗文化内涵。因此,我们在研究它时,既要借助考古学来探寻它在远古时期的起源、源流等问题,也要利用民族学、民俗学自身的学科体系和方式、方法来研究它的流变与传承,方能使其体系得到沿袭和完善。研究包括民族民俗文物在内的民族民俗文化时,在利用好民族学、民俗学的理论和方法的同时,还必须运用好考古学的一些理论和方法,特别是通过考古对其原生态面貌的还原,以复原出当时社会的面貌,才能对民族和民俗的当时环境、文化背景,特别是文化内涵进行全方位的把握和系统的了解,以对当时的原始面貌(或原生态状况)作出科学的判断。比如,我们在了解一个民族或族群的原始居住面貌时,除通过一些地面文物的信息和文献资料的查阅外,更重要的是从古遗址或墓葬的发掘来恢复当时的居民点或居住环境,方能对其原生态作出全面的了解和科学的阐释。在三峡的考古发掘中,很多遗址和墓葬就是这样呈现在我们面前的。如,秭归卜庄河古墓群,其所展现的除了葬制、葬俗、礼制等墓葬本身的特点外,其墓葬的位置、方位、方向等等,都是对当时社会状况的一种复原,这与现在我们不少地方仍然流行的看墓地风水、选择好的阴宅、为死者随葬一些物品等习俗如出一辙。自古以来,风水宝地是人们心目中最好的向往,入土为安是亡人的最后归宿。在历史上,上至王公贵族,下至黎民百姓,都对墓地的选择极为重视。在很多家族的家乘、家谱中,先世墓地图是重要的组成部分,其内容有墓地的山川形式、方位道路、茆地四至、墓地规划、墓主名讳、姓氏等。所以,人们对墓地位置的选择十分重视。我们通过对古代墓葬的各种特点和现代一些民族、民俗特点,特别是丧葬、丧俗等特点的综合分析研究,我们便有了文化复原的第一手资料和据此作出科学评判的依据。这样,我们对包括古代墓葬和现代丧葬在内的文化的解读不但容易多了,而且会更加深刻和完善。再比如,对某件民族民



俗文物或器物的研究,借助考古学,也会对它的文化内涵作出更加深刻的阐释。从一些出土器物的造型和纹饰来看,也有很多是反映民族、民俗文化内容的,如,新石器时代出土陶器上的一种纹饰——麦穗纹,其所包含的内涵是“岁岁平安”之意,这是一种民俗心理和民俗信仰在器物上的反映。这样,考古学又直接服务于民俗学了。

此外,考古学借用民族学、民俗学的一些材料,如,借用巴人起源的传说、巴蛮子割头保城的故事、巴民族崇虎信神的习俗信仰等等材料,对恢复和复原考古遗址所反映的当时社会的原生态面貌,对考古学研究某个文化层阶段的各种社会制度等,也是必不可少的。从而得到对这个文化阶段的各种社会制度的大概了解。18世纪的俄国科学家B.H.塔季谢夫在《关于撰写俄罗斯历史和地理的建议》中指出:“在描述每一个民族时,必须写清楚他们的体型状态:是高大的还是矮小的或者粗壮的,肩膀如何,宽脸型还是圆脸型,肤色是灰黄的还是黑色的或是白色的;鼻子是尖的还是圆的,是高耸的还是扁平的;头发是黑色的还是褐色的,或者是白色的,其长度如何;是否有大鼻子和大嘴,嘴唇是厚的还是中等的,皮肤是黝黑的还是白色的或黄色的……这一切尽量记得多些,倘若能找一位写生画家将上述一切勾画下来,那将是非常好的<sup>②</sup>。这就要求我们在研究民族学时,要高度重视起一个民族或民族个体的这些细节来。对古代墓葬(群)的研究,当对墓主人的民族、族属等问题不能准确判断时,除了常规的理论和方法以外,利用上述民族学的方法,按照B.H.塔季谢夫对一个民族各个细节的具体描述,再与其他民族进行比对,其族群或族属就会一目了然了。这样,不但是考古学为民族民俗学服务了,而且民族学、民俗学又为考古学服务了。考古学和民族学、民俗学之间的互渗与交融可见一斑。

然而,由于种种原因,使得在我们的现实中,常有人把民族民俗文物视为明清甚至近现代以后的地面文物,加上在重古轻今思想的支配下,使得这方面的工作在部分地方得不到重视,民族民俗文物不但与考古学脱离了关系,而且这一工作也常被忽略。由此造成的后果之一是,民族民俗文化研究的断档现象时有发生,比如,三峡古代的蛮、濮、彭等人的流变、去向在哪里,虽然有不少人涉足了这方面的研究,但由于资料的匮乏,包括地下考古资料和地面民族民俗实物资料的缺档断线等,使得这些问题至今仍然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而通过三峡考古及其一直

沿袭下来的地面民族民俗文物对巴文化和土家文化的研究,却给巴文化和土家文化找到了清晰的轮廓。所以,笔者认为,对一个民族或一种民族文化的研究,仅停留在早期的考古发掘或晚期包括民族民俗文物在内的研究上,都是有失偏颇的,因为历史和文化是不允许分割的。只有将考古学和民族学、民俗学有机地结合在一起,才能找到一种文化的“根”与“脉”……

### 三. 考古学与民族学、民俗学的互渗

综上所述,考古学与民族学、民俗学相结合,是具有重要意义的。研究人类历史文化是他们共同的责任和终极目标,只是各自的侧重点不同而已。所以,我们要利用好考古学、民族学、民俗学来共同完成研究人类历史文化的重任,

从方法论上讲,考古学是通过田野调查和发掘,主要利用实物资料,即从地下发掘的各种文物,包括古代的墓葬、城市、村落的遗址、居住的遗址、古人的工具和武器等文物,来研究古代人的生活和文化(也包括人类学的研究),洞悉古代人类物质遗存的内涵性质与时空关系,以了解古代人类行为与社会文化的原生态状况及其发展过程;它是以消亡的文化遗存、古人类化石等为研究对象的。而民族学、民俗学则是侧重于以现存的人类社会,即以活的现实生活、活的人为研究对象,通过人们日常的物质和精神生活,来研究人类文化现象的。从技术手段上讲,考古学是利用地层学、类型学、田野调查、发掘等手段来完成的;民族、民俗学则是以走访、观察、查阅文献等形式来完成的;从时间上看,考古学是通过对古代文化遗迹、遗物的调查、发掘、整理来研究古代民族和民俗的形成、流变的,主要研究古代部分;民族学、民俗学除研究古代的民族、民俗文化外,主要是通过深入到现存的民族、民俗社会之中去获取民族、民俗文化资料,所以,它在重视过去的同时,也重视现在,特别是仍然存在于现实生活中的民族、民俗文化事项……

考古学和民族学、民俗学即便有这么多的不同或差异,但他们也有很多相同、相似、相近、相借鉴、相渗透的地方。如,在研究方法上,民族学调查要到民族地区去。考古学调查也要到古遗址、古墓葬的地方进行发掘调查。两者都同样要到现场进行观察研究。

考古学中的类型学也可以应用于民族学、民俗学中,将民族学、民俗学中的材料按类型学的方法进行分类和比较。而考古学中的地层学的一个重要作

用是反映一种文化的时间先后,其每个层位的遗迹、遗物内涵,与地面留存的民族民俗文物或民族民俗文化事项在很大程度上是存在对应或延续关系的,因为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民族风格、不同的风俗习尚、不同的精神风貌。那么,考古中的每一个地层内涵往往就体现出这个层位所反映年代的一些习俗和风尚,它可以与“处于相同发展阶段的现存民族的社会生活、家庭关系、婚姻制度、宗教信仰等中进行分析、对比”<sup>②</sup>。而民族民俗文物是沉积着历史上很久以来的、深邃的历史文化积淀和现实生活中的文化内涵的,既包涵着诸多的古代文化信息,也包括有现存的民族、民俗文化事项,都从不同角度或不同层面将古今的历史或文化进行着连接和补充。所以,它们之间都相互地为对方服务着。同时,考古学中的一些现象,借助民族学、民俗学来解释,还会使不会说话的“死”的考古资料变“活”起来,这对复原当时的文化生态来说是极其宝贵的。

当今社会是以人为本的社会,当今的时代是全面贯彻科学发展观的时代,那么,我们在进行学术研究的时候,也应体现这种理念,用科学的、发展的眼光来统领学术,用立体的视野来研究问题,以科学为本,将考古学与民族学、民俗学结合起来,进行综合性的运用和研究,一定会对我们的学术大有裨益……

注释:

① 郝国胜:《试述三峡文物保护规划的意义》,《中国历史文物》2005年第5期。

② A. 雷永春:《DNA测定——巴人故里在长阴》,《北京青年报》,2003年4月28日。

B. 雷永春:《DNA测定:土家人是古代巴人的后裔》,《北京青年报》,2005年6月6日。

③ 赵冬菊:《从三峡考古看巴人的生活习俗》,《三峡大学学报》2005年第4期。

④ A. 赵冬菊:《三峡地区巴楚文物与巴楚文化研究》,《巴楚文化研究》,中国三峡出版社,1997年; B. 杨华:《鄂西地区与成都平原夏商时期巴蜀文化陶器的研究》,《湖北省考古学会论文选集》(三),江汉考古编辑部,1998年。

⑤ 湖北省博物馆:《宜昌前坪战国两汉墓》,林春主编:《葛洲坝工程考古成果汇编》,武汉大学出版社,1990年。

⑥ 湖北省博物馆江陵考古工作站:《1981年湖北省秭归县柳林溪遗址的发掘》,林春主编:《葛洲坝工程考古成果汇编》,武汉大学出版社,1990年。

⑦ 《三峡坝区前期准备工作中的考古发掘初见成果》,《江汉考古》1986年第1期。

⑧ 孟华平:《秭归庙坪遗址首次发现龙山时期遗存》,《中国文物报》1996年5月5日。

⑨ 邓辉:《试论巴楚文化交流》,林春主编:《葛洲坝工程文物考古成果汇编》,武汉大学出版社,1990年。

⑩ 谭维四:《巴楚音乐文物与长江三峡地区的古代文明》,《长江文化论集》第一集,湖北教育出版社,1995年。

⑪、⑬ 林永仁、来层林:《巴楚文化》,华文出版社,1999年。

⑫ 徐梅:《坝区文物考古获重大成果》,《中国三峡工程报》1993年8月18日。

⑭ 彭万廷、冯万林主编:《巴楚文化源流》,湖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

⑮ 郝国胜:《试述三峡文物保护规划的意义》,《中国历史文物》2005年第5期。

⑯ 周凤琴:《从红花套遗址的发掘探讨该区新构造运动特征及古地理环境》,林春主编:《葛洲坝工程文物考古成果汇编》,武汉大学出版社,1990年。

⑰、⑲ 杨堃:《民族学概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

⑱ 《三峡坝区考古获丰硕成果》,《中国文物报》1994年2月20日。

⑳、㉑ 国家文物局三峡工程文物保护领导小组湖北工作站编:《三峡考古之发现》,湖北科学技术出版社,1998年。

㉒ 《葛洲坝工程考古成果汇编》,王晓宁《湖北鄂西自治州馆藏青铜器》,《文物》1990年第3期。

㉓ 雅·雅·罗金斯基 马·格·列文著,王培英等译《人类学》,警官教育出版社,1993年

(责任编辑:周广明)